

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丛书

发展的代价：

环境与发展的伦理审视

COSTS OF DEVELOPMENT:
AN ETHICAL REFL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史军 著



科学出版社

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丛书

发展的代价：环境与发展的伦理审视

史 军 著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的价值立场与政策选择”（项目编号：2012JDXM011）资助
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雾霾监测预警与防控”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探讨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三者之间的关系,试图以可持续发展协调环境与发展的冲突,以社会正义协调发展与公平的冲突,以环境正义协调环境与公平的冲突,再以可持续发展统领环境、发展与公平。本书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代价和健康代价进行了梳理,对传统的增长型经济发展观念以及作为其价值基础的经济理性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批判,对环境正义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可持续发展的公平内涵进行了剖析,对造成环境危机的西方近代哲学思想进行了反思,并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找到解决当代环境问题的生态智慧。

本书可以为广大关心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读者提供一种伦理视角。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发展的代价:环境与发展的伦理审视/史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8

(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丛书)

ISBN 978-7-03-0445516-1

I. ①发… II. ①史… III. ①环境发展—问题—研究 IV. ①X-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602号

责任编辑:伍宏发 孙 静 王腾飞/责任校对:李 影

责任印制:徐晓晨/封面设计:许 瑞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3/4

字数:285 000

定价:89.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要编写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宏源	史 军	庄贵阳	苏向荣	李志江	李廉水
宋晓丹	张永生	周显信	郭 刚	诸大建	凌萍萍
曹明德	曹荣湘	巢清尘	焦 冶	蒋 洁	董 勤
潘家华	Catriona McKinnon	Donald A. Brown			

丛 书 序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气候变化问题不仅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也是当今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特别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事关人类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逐渐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纷纷采取政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快向绿色低碳发展转型。

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发展问题，而且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指出：“全球环境问题大半是由发展不足造成的。”发展中国家在减排和改进技术的同时，不能“搁置发展”，而应保持一种在富国与穷国共同努力基础上建立起的“低碳增长”。阻止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后果远比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作为要严重得多。如果没有强劲的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极难自己脱贫。为了控制气候变化而停止或大幅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经济上是不必要的，在道德上也是不负责任的。在经济发展阶段，减排通常都是以发展为代价的。因此，对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气候谈判的实质乃为发展而战，合理的排放权意味着合理的发展权。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削减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也不应该是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问题。

气候变化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引起的，他们从能源的使用中受益，同时也因使用能源而造成了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对世界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们而言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灾难：疾病和死亡、干旱、洪水、高温、暴风雨、海平面上升（淹没村庄和家园）、作物歉收或绝收、自然资源减少或耗尽、传统食物来源的中断、淡水资源短缺等。而所有这些风险都可能是灾难性的。一部分人在另一部分无辜者受伤害的基础上获得利益，这是不道德的。只有当一个国家在气候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别的国家尤其是世界上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且气候政策能够使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安全范围内时，这个国家的气候政策才能为世界广泛接受。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过量排放危害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利益。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应该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原则，历史上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严重超标的国家和地区需要承担起历史责任，率先大幅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在得到资金、技术支持的情况下，也应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行动，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应有贡献。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适应和低碳发展的双重压力，客观上需要有一种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国际气候制度的保障。碳公平，不是一种字面上的机械的名词，它更是一种机制，一种发展权益的保障机制。保护全球气候，客观上存在一种碳预算总量的刚性约束。服从这种地球资源的有限特性，是可持续性的基本要求。当今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就是要寻求建立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平合理机制，使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对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首先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出现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解决气候问题更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广泛参与。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8月，致力于气候变化政策的全方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此次计划出版的这套文丛对气候变化中所涉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等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展开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可以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和国家气候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撑，也可以为中国在气候变化国际政治博弈中占据国际舆论道义制高点争取必要的话语权，同时为国内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这套文丛在学理和方法上开展了大量深入、富有创意而极具建设性的研究，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有着积极的学术贡献。相信这套研究成果将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研究的工作带来有益的启示，也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有利于推动制定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与国内制度、政策。

潘家华

目 录

丛书序

第一章 导论：环境、发展与公平	1
第一节 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1
一、为什么要发展？	3
二、为什么要保护环境？	4
三、应当如何发展？	8
第二节 发展与公平的关系	10
第三节 环境与公平的关系	14
第四节 环境、发展与公平的关系	18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9
第二章 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	21
第一节 空气污染	22
第二节 水污染	27
第三节 物种灭绝	32
第四节 生态退化	34
第五节 全球变暖	38
第六节 本章小结	42
第三章 经济发展的健康代价	43
第一节 污染成疾	44
一、空气污染的健康伤害	44
二、水污染的健康伤害	48
三、全球变暖的健康伤害	50
四、生活污染的健康伤害	51
第二节 饮食成疾	52
第三节 劳累成疾	5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57
第四章 环境与发展——可持续发展	59
第一节 增长的极限	59
第二节 零增长的稳态经济	63

第三节 反增长计划.....	69
第四节 可持续发展.....	7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79
第五章 环境与公平——环境正义	81
第一节 环境与不平等.....	81
第二节 气候与不平等.....	84
第三节 环境正义运动.....	85
一、拉夫运河事件.....	87
二、沃伦抗议事件.....	89
三、美国的有毒废物与种族报告.....	91
第四节 走向环境正义.....	92
第五节 本章小结.....	98
第六章 发展与公平——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99
第一节 经济发展与不平等.....	99
第二节 全球化与不平等.....	103
第三节 公平的可持续发展.....	106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2
第七章 经济理性的伦理批判	113
第一节 经济理性与公地悲剧.....	113
第二节 从经济理性到生态理性.....	118
第三节 经济理性与人的异化.....	123
第四节 从经济理性到道德理性.....	12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37
第八章 环境危机的伦理反思	139
第一节 环境危机的哲学根源.....	139
一、机械论的世界观.....	139
二、主客二分的认识论.....	140
三、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142
第二节 环境危机的人性根源.....	144
一、基督教人性观：以人类为中心.....	145
二、自然论人性观：被欲望所奴.....	148
三、理性论人性观：以征服为使命.....	151
四、人本主义人性观：以隔离为代价.....	154
第三节 环境危机与人性危机.....	156
一、被欲望所奴役的人性.....	158

二、被自我所迷恋的人性	162
第四节 重塑与自然和谐的人性观	163
一、在与自我的关系中重塑人性观	166
二、在与他人的关系中重塑人性观	167
三、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重塑人性观	168
第五节 重塑与自然和谐人性观的可能路径	170
一、培养节俭的美德观	170
二、树立可持续的消费观	171
三、培养“德性之知”的价值理性	172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74
第九章 求助儒家生态伦理智慧	176
第一节 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复兴	176
第二节 儒家生态伦理的哲学基础	180
一、“天人合一”释义	180
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发展	182
三、“天道”与“人道”	184
第三节 儒家生态伦理的基本原则	187
一、“生生不息”	187
二、“仁爱万物”	188
三、“参赞化育”	190
第四节 儒家生态伦理传统的基本特征	192
一、天道人伦化与人伦天道化	192
二、道德扩展主义	193
三、和谐宇宙观	194
第五节 对儒家生态伦理传统的评价	196
一、农业文明的局限	196
二、混沌的整体性	197
三、如何正确对待儒家生态伦理传统	199
第六节 儒家生态伦理传统的现代价值	200
一、儒家生态伦理传统与人类中心主义	200
二、儒家生态伦理传统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202
第七节 本章小结	204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26

第一章 导论：环境、发展与公平

环境、发展与公平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的永恒课题。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人类在发展进程中探索如何正确处理环境、发展与公平三者关系的历史。在许多国家，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贪污腐败成风、社会动荡不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动摇了人们对“发展”的信念，人们开始对现代化和工业化感到失望。进入工业文明以来，随着地球资源的日益紧缺、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如何实现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实现经济社会与人类自身的良性健康发展，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

环境问题既是自然生态问题，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问题，环境保护既要尊重自然规律，也要考虑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不仅要保护自然环境，还要保护人们享有优良环境的公平权利。而发展不仅与自然环境存在辩证关系，也与社会公平存在辩证关系：发展既依赖自然环境，又会破坏自然环境，但恰当的发展也可能有利于自然环境的保护；经济发展虽然有助于提升社会总体福利，但也可能会加剧社会不平等。如何处理环境、发展与公平的关系，决定着人类文明的方向。

第一节 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落后国家和地区逐渐认识到，贫困和不发达既是他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造成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而环境恶化又进一步加剧了贫困和不发达，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人们发现，贫困落后与环境恶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贫困造成了环境恶化，而发展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手段。按照这种逻辑，发展中国家常常将发展经济、消灭贫困作为首要的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然而，这一目标是否确定毫无问题？发展依赖自然资源，同时，发展又推动人类进一步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但凡事过犹不及，当发展变成了一种被崇拜的意识形态，发展本身就变成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造成了对环境变本加厉的破坏。

联合国在 1983 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负责探讨全球自然环境的现状和前景以及经济发展的可能性与制约问题。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基本职责就是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价值和目标之间的关系。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核心议题就是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问题。1972 年，由美国

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Barbara Ward）和微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Rene Dubos）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的报告，以整个地球的前途为视野，从社会、经济、政治角度全面而具体地探讨了人类的环境问题，揭示了人类对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处置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损害的原因。1974年美国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著作《封闭的循环——自然、人和技术》一书出版。该书以美国环境问题为实例，对战后环境危机的根源作了严谨而深入的分析，并在探讨解决危机的途径中，直接触及西方国家最为敏感的社会问题。

环境恶化已成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的共同挑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面临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难题。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过程并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是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并以资源高消费、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但是，“中国现在没有，未来也不会有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曾拥有的环境空间”（姚昕，2012）。今天的高污染，意味着明天的巨大环境治理成本。中国的自然环境正不断恶化，并波及周边国家，甚至影响全球气候变化。虽然中国的发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贫富差距加大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生态环境严重的破坏对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产生了威胁，气候变化引发了洪水、干旱、风暴等灾害。

发展与环境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冲突，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张力不断尖锐化。发展总是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两个层面的后果。在积极层面，发展有助于消除贫困，实现社会进步；在消极层面，发展会产生污染，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在内的环境问题。保护环境和实现生态平衡是自然目标，而通过发展消除贫困，实现人类文明进步是社会目标，在环境目标与发展目标之间往往会产生难以避免的冲突。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例。气候变化这一当下全球最关注的环境问题和第三世界的贫困都是人类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但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发展问题。应对气候变化要求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和全球贫困地区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放缓经济发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加速发展经济又是减少世界贫困的必然选择。减排是环境目标，发展是社会目标。环境目标与社会目标之间是什么关系？减排的目标向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山清水秀的美丽生态画卷，就像美术馆里珍藏的中国传统山水画一样让人陶醉。然而，当我们发现，在这些美丽的山水画中很少看到人的影子，或者看到的大多是辛勤劳作的农夫时，我们是否也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生活在生态之美中的人们生活得是否富裕？他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如果他们大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为饥荒所折磨，缺乏基本的医疗与教育，人均寿命不到50岁，那么，我们是否还会认为这是一幅优美的山水画卷？减排与发展之间的选择困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环境与发展

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为什么要发展？

当发展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之后，就很少有人会问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发展？发展究竟是指什么？是仅仅指经济发展，还是指包括环境、其他物种、政治、文化、道德等在内的人与自然的全面发展？不发展会怎样？发展是否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和唯一的选择？

通常，发展被仅仅等同于经济发展，指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意味着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物质发达、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是，这种发展观却忽视了环境保护和人的发展。针对这种发展观的误导，我国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认为，一切发展都应当服务于人的发展，都应当以人的全面自由实现为最终目标。如果发展最终导致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异化，这种发展就是失败的。

在经济发展之外，发展也应当包含以下含义：

1) 作为自由的发展。发展要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让人能够有更多的能力超越物质的束缚，以追求精神的卓越，而不是使人成为经济发展的奴隶。所谓的自由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自由，还包括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等方面的自由，不同类型的自由可以相互增进。要实现这种超越性的发展，就需要批判西方过度消费主义的生活追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对传统的发展观进行了反思，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发展的全部内涵，不能被看成发展的唯一目标，因为财富只是一个中介物，它的价值是借助其他的事物来体现的。他指出，发展的首要目的应当是自由，并且是实质性的自由，即“个人拥有的按其价值标准去生活的机会或能力”（森，2012）。

2) 作为平等的发展。发展不应是一部分人的发展，而应当是所有人的发展。发展要满足的应当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关注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让人类能够平等地获得生活的物质基础，让所有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不是让少数人过着浪费型的奢侈生活，大多数人却生活在匮乏之中。但是，现有的发展观往往扭曲和忽略了穷人的需求，甚至把穷人遗忘在发展之外。因此，应当倡导民主的和小范围的活动，给予穷人更多自力更生的机会来实现真正平等的发展。

3) 生态发展。生态环境意识源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生态发展观是针对传统发展以持续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及其严重后果而提出来的，它认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不应当相互分离，而应相互统一并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经济发展不应当损害基本生态过程，而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意建设环境和保护环境。生态发展观主张“小的是美好的”，认为小规模工业能够运行得更

为持久，而大规模的工业带来的是经济的无效率、环境污染和非人性的工作环境。生态发展观有助于推动社会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转换。

4) 民族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个不同的国家与民族都应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应当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尽可能避免发展过程中的民族冲突（普雷斯顿，2011）。

如果发展的目的仅仅是生存，那么，我们可能会发现，即使不发展，人类也可以很好地生存和繁衍下去。如果发展的目的是获得利益，那么我们会发现，发展并不总是带来利大于弊的结果，还有许多人、物种、自然资源和环境成了发展的牺牲品。如果发展的目的是获得真正的幸福，那么，我们或许也会发现，仅靠发展本身似乎永远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甚至会离这个目的越来越远。即使发展有助于人类更好地生活与追求幸福，但或许发展只不过是众多生活与生存模式中的一种，而且应当与世界上的其他模式和平共处。或许，不发展、零发展的稳态经济也是一种可持续的、符合“自然法”的生存与生活模式。

二、为什么要保护环境？

对于环境保护，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根本性的哲学反思：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还是为了生态与物种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环境的关心是不是对我们自己的关心？自然界是否拥有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内在价值？

环境与发展的关系说到底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真正保护环境，就必须厘清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污染环境是否合法或合乎道德，这一问题通常不被加以考虑就被抛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反思催生出环境伦理学这一门介于伦理学与环境科学之间的新兴综合性学科。环境伦理学认为，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通过道德规范反映出来，而道德规范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的行为，人们应当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反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中各种动植物的责任。至于应把现代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现代文化改造到何种程度才有利于保护自然环境，不同学派有不同的观点。环境伦理学中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甚至对立的研究派别。一派认为，人类若想走出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必须来一次道德革命或“良知的革命”，必须抑制自己的贪欲，必须告别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另一派则认为，不必有什么道德革命，也根本不可能有什么道德革命，工业文明也许必须过渡到后工业文明，工业社会也许必须发展到信息社会，但不必抑制什么贪欲，不必戒除什么经济增长瘾，人类凭市场经济机制和科技进步就完全可以摆脱环境危机的阴影。前者包含着对人类理性之局限性的反思，从而持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后者包含着关于人类理性进步的极端乐观信念，从

而持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所以，环境伦理学中的两种派别的对立就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间的争论反映着关于环境伦理学的根本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对一系列伦理问题的不同回答。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人“天生”就是别的事物存在的目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例如鱼的存在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这是一种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以人为尺度，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的观点。人类中心主义将保护环境看作是实现人类幸福和健康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其本身值得考虑的目标。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保护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调整人们的行为模式、改变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问题。人类之所以是世界的中心，是因为：上帝最偏爱人类，人是最完美的自然存在物；人是比其他物种高级的存在物，人不光有躯体还有不朽的灵魂，而其他物种只有躯体；只有人具有理性，所以将没有理性的物种当作工具来使用是合理的。在人类中心主义者看来，之所以要保护环境，是因为这样符合人类自身的利益，例如，保护森林是因为其可以为人类提供氧气、木材、药材，防止水土流失，可供观赏等。这样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观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

环境危机的出现对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价值观提出了极大的挑战，而新的环境价值观最关键的变革，就是把道德权利主体从人类扩展到别的生物，甚至整个生态系统。自然界有无持续存在的权利？怎样界定这种新的权利？是否可以将人际道德关系推广到人与自然之间？人对自然有道德义务吗？如果有，是直接的义务还是间接的义务？传统的伦理学只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权利的主体都只是人。别的生物或者整个自然界，不可能作为道德权利主体，从而也不可以享受道德关怀，人们也无须对它们负有道德上的义务。伦理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着的，随着自然、社会和观念的进化，伦理的对象也将从社会范畴向自然范畴扩展。人们曾经认为，那种把黑人视为人，并要求人道地对待他们的观念是荒谬的。这种曾被认为荒谬绝伦的观念现在已经变成了真理。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根本目标在于实现一次道德革命，他们主张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所有的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家而言，关心非人自然世界的原因至少是和关心本身一样重要的，并且“关心应当是非利益性的”（多布森，2012）。

自然界是否有不依赖人类的价值？自然存在物是否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否拥有内在价值？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学的核心就是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认为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可以直接导致我们对自然界及其存在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保护环境符合自然环境的内在价值而不是人类自身的利益。自然环境并非仅仅作为人类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拥有价值，即使它不能成为人类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也仍然有价值意义上的内在价值。

人类中心主义与不符合生态理念的近代哲学有关，现代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在于因过于追求经济目标而对自然的理解变得日益狭隘。概括而言，培根用“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精神发展了导向人类对自然主宰与控制的科学的目标与方法；笛卡儿用“我思故我在”的超越性主体意识将有机的世界（植物、动物等）仅仅看作是宇宙的一般性机械自然的延伸；而牛顿用“万有引力”这一无处不在的机械性力量将宇宙的运转简化为一个“结构紧密的、大量的、坚硬的、不可入的和移动的粒子”的集合。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思想也开始萌芽。斯宾诺莎（Spinoza）是西方最早提出生态意识和环境伦理学的有机体主义者之一，可以把他看作当代整体主义环境伦理学的先驱。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儿的人类中心论，而持一种泛神论思想。在他看来，所有的存在物或客体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同一种物质存在的暂时表现。斯宾诺莎对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理解，使他能够把终极伦理价值奠定在整体或系统，而并非任何单一的、短暂存在的个体基础之上。18世纪的英国思想家约翰·布鲁克纳（John Bruckner）曾对英国在新世界的扩张表示担忧。他在《关于动物的哲学思考》（1768）一书中质疑改变美国的荒野会打乱生命之网和“上帝的整个计划”。他已经认识到，在开垦处女地的过程中，许多物种会受到严重伤害，甚至会灭绝。不过，他没有对这种开垦行为进行道德评价。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是19世纪力主环境保护的思想家，他也是现代生态学的先驱。1845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两年，自耕自食，体验简朴和接近自然的生活，以此为题材写成的长篇散文《瓦尔登湖》（1854），成为自然主义的经典作品。他的生态学思想植根于其超验的整体主义思想之中。他相信存在一种“超灵”（Oversoul）或神圣的道德力，这种力量渗透于大自然的所有事物中。通过直觉（而不是理性和科学），人们就能超越物质表象并领悟那个把世界融为一体的“宇宙存在之流”。他写道：“我脚下的地球不是僵死的、无活力的物质，而是一种拥有某种精神的身体；它是有机体的，流变的，受其精神的影响。”

（梭罗，2015）梭罗表达的似乎是与笛卡儿一样的泛神论生态学，但他用科学的方法观察、叩问自然，在他的日记中满是有关有机体之间以及它们与其环境之间如何相互影响的记录。他亲近自然，主张保护自然，他曾说：“如果那些虐待儿童的人应该被起诉，那么，那些毁坏了大自然的面容的人也应被起诉。”（梭罗，2015）

在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研究于20世纪引起广泛关注之前，为环境伦理做出巨大贡献的思想家还有史怀泽、利奥波德和卡逊等。

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生态观念。“敬畏”一词表示的是在面对一种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时所产生的敬畏或谦卑意识。史怀泽相信宇宙间所有的生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当我们致力于帮助别的生命时，我们有限的生命可体验与宇宙间无数的生命合而为一。他明确指出，敬畏生命绝不

只是敬畏人的生命。他曾说过：“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伦理学的最大缺陷，就是它们相信，它们只需处理人与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当他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的时候，他才是有道德的”。虽然人总难免要杀死其他生命，但这样做必须是为了促进另一个生命，并且要对“被牺牲的生命怀着一种责任感和怜悯心”，这就是敬畏生命的法则。史怀泽显然主张把道德共同体扩展到所有的生物。在他看来，人类在自然共同体中所享有的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所赋予其的不是掠夺的权利，而是保护的责任，为能让人们明白这一点，就要求实现一场“巨大的伦理学革命”（史怀泽，1995）。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是现代美国环境伦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所提出的最重要的思想便是他的“大地伦理”。其著作《沙乡年鉴》被誉为“现代环境主义运动的一本新圣经”。他指出，最初的伦理观念是用以处理人与之间的关系的，后来扩展到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处理人与土地，以及人与在土地上生长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伦理观。利奥波德吸取了生态科学的成果，他相信，“大地有机体的复杂性”是“20世纪杰出的科学发现”。他认为，那种把物种区分为好物种和坏物种的观念，是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偏见的产物。大自然中没有任何事物是僵死的或机械的，生命与感觉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整体主义的基本信念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利奥波德相信，任何一个不可分割的存在，都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物。地球是有生命的，是拥有某种类型、某种程度的生命的有机体。有此信念，便可将人与地球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伦理关系。他坚持认为，“地球——它的土壤、高山、河流、森林、气候、植物以及动物——的不可分割性”就是它应受到尊重的充足理由。他主张“像山一样思考”（利奥波德，2015），即客观地以整体主义方式思考，而不是只从人的立场思考。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继承了史怀泽的敬畏生命的思想，她相信“生命是一个超出我们理解范围的神奇现象，我们即使在与它抗争时也应敬畏它”（卡逊，2008）。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力图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统治与控制自然的日益增长的能力是一柄双刃剑。她的著作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热潮。人类需要她所说的“谦卑意识”和一种强调“与其他生物共享地球”的伦理观念。

维护人类福利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者与人类中心主义者的共同目标，但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对人类中心主义者的指责是，人类中心主义者主张人类就应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物种，即这个物种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如果人类也关心其他物种或事物，归根结底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严重的道德错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这种冲突反映的是人类利益与环境和其他物种之间的冲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我们作出的不同选择，就反映了我们所持有的不同环境伦理观念。如果我们选择为了经济增长而继续破坏环境，那么我们所持有的就是“强”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如果我们选择为了保护环境而停止经济增长——哪

怕有许多人仍生活在悲惨与贫困之中，那么我们所持有的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如果我们选择调整经济增长模式，实行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所持有的就是“弱”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强”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其他自然存在物只有在它们能满足人的兴趣或利益的意义上才具有工具价值。“弱”人类中心主义则认为，应该对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们能够满足人的利益，它们还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物也有内在价值。它虽然承认人的优越性，但也承认其他有机体也是生命联合体的成员，我们有义务从道德上关心它们。在现实层面，作为发展与环境妥协的产物，“弱”人类中心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弱”人类中心主义可以在摧毁生活的进步乐观主义和敌视生活的生态基础主义之间达成平衡，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联结成为一种适度的可持续发展。

三、应当如何发展？

传统的发展只注重经济的增长，这种增长造成了环境危机。自然环境并非人类的免费午餐，经济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和恶化，反过来反而阻碍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以中国为例，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经历了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综合国力有了大幅增强，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正面临着人口过多、环境破坏、空气污染、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现代化、工业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其他问题。中国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已经无法承受“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人均资源拥有量很低、单位产值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出数倍，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因此，环境资源约束使得中国制造业传统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呈现出不可持续性（唐德才，2008）。

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Boulding）在 1966 年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学”，指出我们的地球只是茫茫太空中一艘小小的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的无序增长迟早会使船内有限的资源耗尽，而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排出的废料将使飞船污染，毒害船内的乘客，此时飞船会坠落，社会随之崩溃。波尔丁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牧童经济”，就像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对资源和环境无所顾忌，只顾追求牲畜数量上的增长。如果经济系统是一个宇宙飞船式的封闭循环系统，那么，经济发展就应是资源储备型、能休养生息和福利型的，合理的发展模式应能对自然物质进行循环利用并使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得到合理和长久的利用。

一些环境经济学家提出了“绿色经济”理念，主张从社会及其生态条件出发，建立一种可承受的经济。“绿色经济”的支持者们一直声称，环境保护同高的经济增长率是完全一致的，只要这种增长主要发生在环境友好部门就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事实证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仅凭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是远远不够的，